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陈奕诺,田丹婷.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之理论探析[J].知与行,2017,(12):23-26.

· 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题 ·

法兰克福学派科学技术批判之理论探析

陈奕诺¹,田丹婷²

(1.黑龙江大学 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 2.黑龙江省社会科学信息中心,哈尔滨 150001)

[摘要]随着人对科学技术过度依赖的社会现象的凸显,人的生存问题已成为20世纪哲学界的关注热点,技术理性批判理论不断发声,存在主义、科技哲学中的批判理性主义和社会历史学派、技术悲观主义思潮等,都把对技术理性主义批判当作其问题的重要核心。其中,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之一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理性的剖析和批判更为系统。该学派批判的焦点集中在实证主义、启蒙精神、大众文化、科学技术理论上,其中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最为精妙,他们另辟蹊径,从批判理性的角度出发,把科学技术定性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对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讨论始于霍克海默,经过马尔库塞的发展,到哈贝马斯才得以完成。这种深刻的批判对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但也要注意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所提出理论的局限性。因此,我们要建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念,不能仅仅以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重心,以GDP的总量为追求目标,过去无节制的发展已经给自然和社会带来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应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世界境况的科学技术发展运行机制,在人文精神和科技精神相互统一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复兴之路。

[关键词]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批判;法兰克福学派

[中图分类号]B08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7)12-0023-04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深刻地批判,其主要焦点集中于科学技术的消极作用。从40年代起,在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对社会制度的批判已经不仅仅只是停留于表面并且已经深入到科学技术领域之中,法兰克福学派认为科学技术已成为资本主义社会新的控制形式,造成了“单向度的人”、单向度的思维方式、单向度的社会。围绕这个核心,他们主要从人的生存状况、政治统治、意识形态三个维度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刻反思,“上演了”一幕科学技术批判的三部曲。

一、科学技术与单向度的人

法兰克福学派的杰出代表当属马尔库塞,他从人的生存维度对科学技术进行了深入批判,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单向度”生存状况的揭示,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揭露无遗。这里的“单向度”意味着一体化、同一化之意,即社会同国家一体化、个人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一体化以及每个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个人所具有的各种机能的一体化^[1]。经过一体化或者说被资本主义同

[收稿日期]2017-11-20

[基金项目]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清算——青年马克思思想的蜕变”(YJSC2016-011HLJU)

[作者简介]陈奕诺(1987-),男,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化的个人,成为一个失去了否定性、批判性、革命性和超越性的“单向度”的人。而由单向度的人组成的发达工业社会也变成了一个单向度的社会、一个极权主义的社会。不过,这是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因为不是恐怖和暴力而是技术进步造成了一个这样的社会。因此,马尔库塞认为:“面对这个社会的极权主义的特征,技术‘中立性’传统概念不再能够得以维持。技术本身不能独立于对它的使用;这种技术社会是一个统治系统,这个系统在技术的概念和结构中已经起着作用。”^[2]

自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成为时代的主流,尤其是近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工智能机器正日益替代和降低人在体力劳动中所耗费的体力,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对于传统工人的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工人对于劳动和生存状态的态度及工人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尔库塞指出,这种变化虽然看似重大,实际上只是现代技术给人的一个虚假幻象。因为,在技术的总体效果范围内,自动化和半自动化占据了大部分工作时间的机械劳动,这看似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实际上是技术对生命的一种长期占有、消耗和麻醉,是一种非人的苦役,甚至是更使人疲惫的苦役,因为机械化和自动化加快了劳动速度,控制了机器操作者,进而将人们相互隔离开来。即使是对于高度发达的自动化工厂中的“白领”来说,也处在这种体力转变为技术和思维技巧的奴役下,这种奴役在本质上和打字员、银行出纳员、繁忙的推销员等所受的奴役别无二致。标准和常规同化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工作,以前那些在资本主义阶段受劳役重压的无产者还持着对社会的否定、厌恶的态度。然而,科学技术水平高度发达的城市中的工人,却面临着明显缺乏否定性和批判性思维的生活,他们同科学技术不发达城市的劳动工人一样,顺应并且正被纳入到受统一管控的“技术共同体”当中,不仅在科学技术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且在科学技术最为发达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中,某种“技术共同体”正在使工作中的工人们一体化、归一化。技术世界的机械化进程破坏了人们内心深处保存秘密的自由,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与现存制度一体化了,超越、否定现存制度的思想和行为都被视为异端。

马尔库塞敏锐地察觉到,在这些所谓的“老牌”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的无限地应用所带来人的地位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从而体现了他所持有的对现代技术的极权主义统治的否定和批判态度。单向度的人出现不仅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一个消极的现象,而且对于社会的进步来说也是一个反作用力。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凭借组织自身的技术基础和方式成为极权主义的,它不仅通过技术使自身不断自我扩张和自我永恒化,它还排除了所有反对思想的出现,使自身也成为单向度的存在。

二、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

法兰克福学派不仅仅停留于对人的生存维度的批判,而且进一步深入到政治维度,对科学技术进行深刻地批判,其切入点是政治统治和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该学派认为,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代替过去暴力、恐怖的政治统治手段,成为发达工业社会一个新型的统治手段和控制形式,科学技术操纵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创造了一个新的极权主义社会,科学技术成为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者。

“启蒙的辩证法”在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理性批判中具有奠基的作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于《启蒙辩证法》中指出,随着人们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的不断征服,“启蒙”所设想的人的普遍自由没有实现,相反,却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导致了自然对人的疯狂报复,启蒙走向了“自我毁灭”。更为糟糕的是,还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导致了人对人的统治,科学技术既是人对人统治的手段也是人征服自然的工具。在发达工业社会,统治的原则发生了变化,原来那种基于原始印记的、蛮横无理、横征暴敛的统治,让位给一种更巧妙的统治,即借助技术手段的科学技术统治,科学技术已控制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种统治意志的内化主要是通过技术的手段来实现的,随着技术的进步,经济上生产率的提高,使人类驾驭自然的力量空前提高。一方面个人对他所服务的“机器”唯命是从;另一方面人们比过去更高效地享受到了技术带来的优越性。人们的受控制性和无权力感伴随着他们自己所分配得到物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社会底层的人民“物质”生活平均水平得到了缓解和提高,相比之下,人们的“社会”生活平均水平的提高却显得不足挂齿,虚假地传播思想恰恰反映了这种情形。这种情况的真实是物化的否定。当这种状况固定为文化用品,并付诸消费时这种情况就必然融化了。同时,精确的信息和经过精密设计的消费用品的大量出现,都愚弄了人们,使人们变得愚蠢。

哈贝马斯对于科学技术与政治统治关系的认识,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基本上是一致的,他同样认为科学技术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工具。但他同时指出,技术理性的统治和传统的统治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技术理性统治的基础不再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而是技术与科学。哈贝马斯在其《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以及《理论与实践》著作当中,着重论述的就是统治的合理化与科学技术进步的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已经代替过去横征暴敛、蛮横无理的政治统治手段,成为发达工业社会一个新型的统治手段和控制形式,科学技术操纵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

哈贝马斯巧妙地借用韦伯的“合理性”概念来说明科学技术进步同统治合理化的问题。韦伯的“合理性”包含两层意蕴:其一,“服从于合理决断的那些社会领域的扩大。与此相应的是社会劳动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工具活动(劳动)的标准也渗透到生活的其他领域(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交通和交往的技术化)”^[4]。韦伯试图通过这样的观点说明,社会的合理化是同科学技术进步的制度化相联系的,当技术和科学渗透到社会的各种制度从而使制度发生变化时,旧的合法性就失去了效力,从而资本主义具备了合理化的基础。哈贝马斯认为,韦伯这么理解“合理化”并不全面,因为他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效果的分析不够深入、不够彻底,并没有察觉到科学技术对人以及对社会的控制作用。科学与技术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另一方面是技术与社会应用的结合。其二,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与科学、工业、军事和管理结合在一起的技术进步,除了渗透到制度框架外,这个技术系统本身的构建与发展则超越了人的构思,并且技术进步的方向越来越不受外界和下面的指挥,从而使那种超越制度并控制人、社会和自然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点上,哈贝马斯认为马尔库塞看到了韦伯的不足,这种合理性涉及各种问题的正确选择,即技术的运用和在既定的情况下确定目标的诸系统的合理建立。所以,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合理性使得反思和理性的重建脱离了人们在其中选择各种战略、使用各种技术和建立诸种系统的利害关系。”由此,哈贝马斯认为,技术的目的理性活动就是要实现控制,即对人、自然和社会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从而使用科学技术为自身扩张的政治权力(它将一切文化都囊括于自身)的合法性进行辩护。因此,他认为,马尔库塞所认为的科学技术进步使得对人的统治“合理化”的观点是正确的。在当今世界,技术也给人的不自由带来了巨大的合理性,进而证明,要决定自己的生活的人、人要成为自主的人,在技术上是是不可能的。得益于技术理性的发达,现代社会依靠超强的合法性外观,更多地以娱乐、消遣等现代消费手段来行使统治,使人们能够心甘情愿地屈从于现存的社会体系。这也就意味着,通过与传统政治方式的结合,技术理性造就了一个新型的、合理的极权社会。

三、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

法兰克福学派对科学技术的批判极为精妙,他们另辟蹊径,从批判理性的角度出发,把科学技术定性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具体而言,对科学技术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讨论始于霍克海默,经过马尔库塞的发展,到哈贝马斯才得以完成。关于这个问题涉及的著作主要有《科学及其危机札记》《马克思·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单向度的人》,等等。从本质上看,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和科学技术的政治统治功能的探讨,实则为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所以涉及科学技术的政治统治问题的地方,在这里就不再加以展开论述。

(一) 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提出

关于科学技术是意识形态的论断,霍克海默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就已经明确表述过,他指出,科学技术也有自身的局限性,其突出表现为科学开始具有政治统治的功能和意识形态的性质。“科学技术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指出不仅形而上学,而且包括形而上学所批判的科学本身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科学保留着一种阻碍它去发现危机的真正原因的形式。当然,说科学是意识形态并不等于说科学实践者不关心纯粹真理。任何掩盖建立在矛盾之上的社会的真正本质的人类行为都是意识形态。”^[4]从这段话可以清晰地看出,霍克海默认为任何掩盖社会真正本质的人类行为都是意识形态,在他看来科学就是这种人类行为。另外,尽管霍克海默认为科学技术执行着意识形态功能,但是科学还是部分有助于工业生产的。

(二) 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

马尔库塞在《马克思·韦伯著作中的工业化与资本主义》一文中,通过对韦伯的批判,提出了“技术是

意识形态”的观点。在韦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阶段是由国家的强权政治统治的,这种统治主要通过科层组织和“死的机器”的结合来建立奴役的外壳,技术在这个过程中是中立性的,技术理性是分离并服从于政治理性的。马尔库塞对于韦伯的观点是持相反态度的,在他看来,“这种关于同一性的认识,使韦伯难以看出,不是‘纯粹的’、形式的技术理性,而是统治的理性,建立了‘奴役的外壳’;同时也使他难以看出,技术理性的极端能够成为人解放的工具”^[5]。即,他不认为技术理性是中立的,并且它并不完全让位于政治理性,而是政治理性与技术理性已经融为一体,技术理性充当了意识形态的角色。用他的话来说,就技术理性这个词语本身而言,其已经不单单是一个名词而且是一种意识形态了。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角色不仅定位于对技术的无限应用,更定位于对人以及自然的一种科学的、有计划的、慎重的、可靠的统一和控制。统治的利益和目的并不是被赋予或外在强制于技术的,而是已经渗入到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了。

(三) 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意识形态的论述

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这个概念的,即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了一种新的统治和控制工具,并行使着意识形态的职能。哈贝马斯对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的概念是十分赞同的。他在承袭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理论,但这一继承并不是完全没有取舍的继承,而是一种批判地继承。哈贝马斯对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的批判与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开始,科学技术才开始具备意识形态的性质。

而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功能的行使主要体现在使人民大众非政治化。他指出,“国家干预主义的新政策,要求的是广大居民的非政治化”。而群众的非政治化要为群众接受,关键在于将政治问题转变为技术问题,即抬高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技术问题,排除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实践问题,把实践问题非政治化。这里所谓实践问题则是指“对规范的接收或拒绝”,而与之相对应的技术问题是:“其目标是合理的手段组织,以及对可选择的手段的合理选择”。正基于此,哈贝马斯认为,正是科学技术承担抬高技术问题并排除实践问题,从而使广大群众非政治化的职责。“政治是以消除功能失调和排除那些对制度具有危害性的冒险行为为导向,因此,政治不是以实现实践的目的为导向,而是以解决技术问题为导向。”“随着实践问题的排除,政治舆论就失去了作用。”技术问题的解决就不依赖于公众的讨论了,公众的政治参与也没有必要了,政治决定成为一种职业技术,信息只能在专家间交流,整个政治科学化了。

四、结语

现今的中国正处于过渡和转型时期,而科学技术的无节制发展正在把整个世界卷入到不受控的“旋涡”中心。在向更高水平的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我们必然要经历一场深刻的文化精神冲突:一方面为了给人类谋取到在生活上更大程度的幸福感,就必须大力发展科技,推崇技术至上;另一方面现代科学技术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一个物化和异化的世界,使人类陷入困境。法兰克福学派的科学技术批判理论的提出虽然距今已有一些时日,但其理论并未完全过时,对于科学技术正在飞速提升的中国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通过对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深刻剖析,我们应辩证地从中梳理出合理因素并加以运用,同时,也要注意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所提出理论的局限性,树立正确的科学技术观念,我们不能仅仅以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重心,以GDP的总量为追求目标,过去无节制的发展已经给自然和社会带来不可逆的损伤。我们应努力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世界境况的科学技术发展运行机制,在人文精神和科技精神相互统一的基础之上,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带有中国特色的复兴之路。

[参 考 文 献]

- [1] 陈学明. 马尔库塞的六本书[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 126.
- [2] [美]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刘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67.
- [3] [德] 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 郭官义, 李黎, 译.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2: 38.
- [4] [德] 霍克海默. 科学及其危机札记[M]. 曹卫东, 选编. 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 161-162.
- [5] [美] 马尔库塞. 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马尔库塞文集[M]. 李小兵, 等,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105.

[责任编辑: 崔家善]